

理论与实践

《邓小平文选》学习辅导专刊

(上册)

汪
1983.9.30.
吕大。

中共辽宁省委理论与实践杂志社

目 录

序.....	刘异云 (1)
在正确路线的航道上胜利前进.....	顾 明 (2)
为全面、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斗争.....	(6)
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9)
尊重知识, 尊重知识分子.....	(12)
大力兴办教育事业.....	(14)
重视科学, 努力发展科学事业.....	(17)
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20)
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22)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25)
经济上的一个大政策.....	(27)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29)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1)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34)
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	(37)
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39)
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	(42)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44)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46)
把机构改革继续引向深入的根本指针.....	(50)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	(52)
把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认识提得更高一点.....	(54)
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57)
促进党风根本好转的重要思想武器.....	(59)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62)

序

刘 异 云

辽宁省委《理论与实践》编辑部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即将出版的《邓小平文选》，及时地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文选〉学习辅导专刊》，在大家用心自学的前提下，相信能发挥它一定的辅导作用。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的人都已晓得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中央集体领导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掌舵、决策的作用。但是还不能说大家都已了解得很清楚、很明确、很透彻，这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在近七、八年来一系列的重要讲话、谈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这一次《邓小平文选》公开出版，将会使广大干部和人民进一步认识到：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就率领我们和“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重新出来工作前后，率领我们反对“两个凡是”方针，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接着，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率领我们拨乱反正，正确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以来的历史经验；

紧接着，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又率领着我们探索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以上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为了认识面临的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集中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和智慧，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问题，其中有一些是重大的新的理论问题。所以说，《邓小平文选》是一本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著作。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当时邓小平同志讲话的文件和传达，我们是看到过、听到过、学习过并为之努力贯彻过的。我们曾经是如饥似渴、久旱盼甘霖一般，带着迫切的心情和高昂的革命激情，有时是满盈着希望的热泪学习和讨论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的。学习、讨论以后，大家总觉得豁然开朗，心情舒畅，眼明心亮，干劲倍增。因为我们都是处在“团结奋斗，振兴中华”第一线的人，所以，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对我们党和国家在解决各个阶段关键性问题中的重大作用和推动力量，我们曾经是那么亲切地、深刻地和生动地感受和体会到了的。这一次重读时，还是充满着如此的心情。

《邓小平文选》在文风上也有显著的中国民族特色，这就是简明、朴实、生动和口语化。所以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最好，把《邓小平文选》的学习和总结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联系起来，和总结我们个人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这样，我们从《邓小平文选》以及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和三中全会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可以学习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可以学习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果断勇敢的革命气魄。我们还可以学习到如何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又能解决多种复杂矛盾的领导艺术。这将会有效地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提高和加强我们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提高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总之，只要我们认真学习，而且各级党组织把学习组织得好，即将出版的《邓小平文选》，有可能使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有一个较大的、甚至是很大的提高。

一九八三年六月

在正确路线的航道上胜利前进

顾 明

《邓小平文选》出版了。这是一部在我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论著。

《文选》收入的是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期间的重要言论。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同“四人帮”的尖锐斗争；结束了为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全面拨乱反正，党和国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现在，学习《邓小平文选》，回顾这一段历程，使我们更加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原则上的坚定性和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以及在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利益上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这里着重谈谈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一系列论述的体会。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点

林彪、“四人帮”为了反革命的目的，严重地歪曲、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狂热地制造个人崇拜，把革命导师的言论变成宗教教条。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一时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阻碍着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进行。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首先打碎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果敢地提出了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久，他又严厉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浓雾仍在中国上空弥漫的情况下，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

解毛泽东思想和反对“两个凡是”，恰似一股春风催苏万物一样，使人们长久被禁锢的思想受到了激发。这无疑是以后席卷中国大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随后，邓小平同志在一系列讲话中着力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并详细论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点。

例如，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针对“两个凡是”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这段话深刻有力地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实质，同时明确地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用较长的篇幅来说明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坚持这个根本观点的。他指出，这种根本观点不会过时，反对这种根本观点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再如，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篇谈话中，他区分了真假两种高举。一种是“两个凡是”，这种高举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只能损害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是真正的高举，最好的高举。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实事求是。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一再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的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论证过的问题。可是，《光明日报》登了那么一篇文章，却引起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说是“砍旗”。争论由此开始。邓小平同志当时就说，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又说，这场争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还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实际上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是解放思想的倡导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把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作为一个严重任务提出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并被三中全会确定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

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讲思想解放，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两个解释，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意思是一致的。解放思想，当然不是指的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而是指我们的思想不受任何偏见束缚。只有不受偏见束缚，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才能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所以说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批判了那种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的错误论调。他说，解放思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他提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显然，为了坚持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今后仍然必须坚持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党的八大曾经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是，以后我们逐渐偏离了这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搞以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为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致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实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力挽狂澜，通过抓整顿来结束动乱，恢复各方面的秩序，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做法当然难以见容。

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规定为新时期的总任务，但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陷入了徘徊中前进的艰难局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在这个期间，邓小平同志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另一方面为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和消除它的后果而作出重大努力，为实际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创造条件。他再三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还直接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说，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已经定下来，就是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要扭着不放，要专心致志，要聚精会神，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

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有这些，邓小平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论述。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他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是当前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方面

组织路线是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的保证。在解决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以后，邓小平同志又把注意力放到解决组织路线上来。他在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都谈了这个问题。

他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这一篇谈话中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

他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中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这对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恢复和确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老同志毕竟岁数大了，精力不够。而且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

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组织路线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选拔接班人，首要的是政治条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干部队伍理所当然地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具体来说，有这样两条标准，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对于那些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不然就会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

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不行。要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他分析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数量并不算少，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他指出，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专业人才，并按照专业的要求组织和更新整个领导班子。

子。

邓小平同志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同体制改革、精简机构联系起来，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能的工作岗位上，并且早点上来，好接班。他强调这场对体制的革命不搞不行。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特别是老干部，要坚决克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把解决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问题，真正看作是一个战略问题，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恢复、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经他反复阐明的党的路线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也正在越来越被实践证明其正确性。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在正确路线的航道上胜利前进。认真领会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大大提高贯彻执行十二大精神的自觉性，应该是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一个主要目的。

为全面、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斗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邓小平同志为全面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五年，“文化大革命”已延续了九年时间。当时，敬爱的周总理病重，江青反革命集团更加猖獗。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召开了解决工业、农业、交通和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他在《各方面都要整顿》中提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小平同志从整顿军队开始，狠抓各项工作的整顿。在各项工作整顿中，他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必须同派性作斗争，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等重大措施。锋芒直指“四人帮”，目的是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政治安定，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粉碎了“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了，党内外同志强烈要求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小平同志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在推动和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发挥了决策作用。

（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之风盛行，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要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

全面清理，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不能不涉及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可是，当时华国锋同志却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致使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局面。在这重要关头，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严肃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对于当时正在全面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小平同志表示支持。他鲜明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打破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设置的禁区，扫除了拨乱反正的严重障碍，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小平同志提出的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才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禁锢，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

(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鼓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乱了，造成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观点是错误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小平同志在一篇重要讲话中，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决议》的意见里，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滥用“路线斗争”的错误。他说，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

针对林彪、“四人帮”恣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行所谓“全面专政”造成的恶劣后果，小平同志强调要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小平同志认为，实现民主和法制，不能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化大革命”已经证明，“四大”只能助长动乱，应该取消这种错误做法。他还提出，纠正冤假错案，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由于我们党果断地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并抓紧平反冤假错案，使我国消除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只抓所谓“革命”，破坏经济建设，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到巨大损失。一九七五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四人帮”却极力加以诋毁和攻击，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继续制造混乱，使我们无法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

一九七八年九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次谈话，为三中全会确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一重大方针作出了决策。以后小平同志还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

一九七九年初，小平同志又适时地对经济调整作了重要论述。他说，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看来，我们的经济，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这次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但是局部的后退是必要的。退一步才能进两步。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党中央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是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拨乱反正。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纠正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清除了经济工作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现在，我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稳步、健康的发展轨道。

(四) 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在我们党内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摧残科学教育事业，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英雄”，把为祖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完成这方面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小平同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七七年五月，小平同志尚未出来工作，就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篇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不久，邓小平同志便自告奋勇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在关于科学和教育问题的谈话中，他针对“两个估计”说，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毛泽东同志在《纪要》上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又提出，要正确地理解“七·二一”指示，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一定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小平同志抓住了批判“两个估计”和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首先冲破禁区，从科教战线上打开拨乱反正的局面，把广大知识分子从“两个估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科教战线出现了新气象。

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着重从理论上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代表党中央明确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正在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小平同志重视知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正确估计，不仅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而且对于目前贯彻党在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方针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重新回顾从粉碎“四人帮”，全面拨乱反正，到工作重心转移，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斗历程，我们深切地感到，如果不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在这段历史进程中，小平同志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为全面、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为确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方针政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粉碎“四人帮”之后，如何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成为能否纠正“左”的错误，进行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关键问题。邓小平同志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邓小平文选》就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并进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范例。

(一)

对待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十年内乱之所以能发生，究其原因，首先是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乱”了起来。那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和煽风点火，加之多年来党内“左”的思想的发展，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的程度，对毛泽东思想不是当作科学来对待，而是当作“神学”去信仰。林彪说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于是引语摘句成为评判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这个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在《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不仅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而且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即在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工作时，他就抓住了这一根本问题，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邓小平同志说：“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邓小平同志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命题，但已经包含有这种思想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同志不仅没有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而且还继承林彪、“四人帮”的一套，提出了“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经过反复考虑，于一九七七年四月给中央写信，首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接着，又对中央两位同志发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谈话，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极

大关注。他支持这个讨论，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没有这，就不能确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邓小平同志说：“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可见，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在当时是为了直接反对“两个凡是”的。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什么？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按照“两个凡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事，都要坚决“维护”和“遵循”，那么，不要说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而且，“四人帮”也不能被揪出，由于毛主席晚年错误而造成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不能纠正，国家还得回到“文革”中的那种“内乱”中去。这在政治上恰恰是为“四人帮”所需要的。

邓小平同志在揭露“两个凡是”的政治实质的同时，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在理论上的错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领袖是人不是神，因而他一生中不可能不犯错误，更不可能讲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百分之百地正确。我们对待领袖说的话，做的事，就不能采取教条的“凡是”态度，而要根据领袖总的思想体系去全面地领会它。对待毛泽东同志和对待毛泽东思想也应这样。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被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同志不会犯错误，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正确，我们都要照抄照搬，搞“两个凡是”。不要说毛泽东同志说的错误话，做的错误事，我们不能搞“两个凡是”，就是他说的正确话，做的正确事，我们也不能搞“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理解。小平同志这里提出的思想和原则，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原则，不仅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对我们今后学习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有普遍的重大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对“两个凡是”进行批判，阐述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除了从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外，大量的是结合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的工作进行的。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例如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同志一度有过错误思想，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我们就只能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异己的力量、专政的对象。但是从整个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因此，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其他方面，也都如此。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如何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榜样。

(二)

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而且还对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解释和论证。这除了要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出发外，还

必须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根本出发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呢？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大家知道，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的规律中求得解决问题的思想、方针和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问题，把工作做好。毛泽东同志一生中，对此作了大量的科学论述，这都是我们大家熟悉了的。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要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并牢牢地把握住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去解决实际生活中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他说：“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他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且是在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强调要学习和掌握“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根本点的同时，尤其重视要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原则来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和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这就是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从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决策，最后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指导思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三)

在邓小平同志最初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全国刚开始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一些坚持“左”的思想的同志认为，这样会造成“砍旗”，从而会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后来事情发展的结果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样做不仅不会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而且是真正地在维护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在批判“两个凡是”中，一些同志又从另一面对毛泽东同志的某些问题看得过重，因而不是历史地分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而是过于注重个人的责任和品质；不是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本身区分开来，而是因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批评了这种倾向。他说：没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认为，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仅是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有关；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内外的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同志是从这个大局来维护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

针对干部、群众中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存在的错误认识，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

经验的结晶。”并且，这一结晶，早已经被实践证明为客观真理，它并不因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而改变。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也正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客观真理。因此，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另外，就毛泽东同志一生来看，小平同志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也不是唯物主义态度。

关于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问题，一些同志把这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邓小平同志批评了这种看法，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这个问题。历史人物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活动的，因此历史人物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毛泽东同志是在中国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他也必然要受到我国各种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分析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在这些历史条件或因素中，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制度的问题，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因此要从制度上去杜绝产生个人崇拜的条件。我们党后来通过决议，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就是从制度上杜绝个人崇拜的错误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已成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决议》在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而使我国迅速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时期。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政策是否正确，他们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在推动和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为纠正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为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做了巨大的努力。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全党和全民重视知识、学习科学文化风气的出现，都是同邓小平同志的努力和贡献分不开的。

正确认识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是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前提。建国以来，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就在于对知识分子队伍状况做了违反客观实际的错误估计，从而采取了一套“左”的政策和做法。

一九七七年九月，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在当时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顽固存在的情况下，他冲破禁区，力排非议，挺身为知识分子说话。他针对“两个估计”，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这个讲话，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使他们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获得了解放。这是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要开端。

推翻“两个估计”，是基于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科学分析。建国以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国现在的广大知识分子同亿万工人、农民一样，被组织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积极从事社会主义的劳动。他们除了劳动方式上的差别外，从取得生活资料来源的方法和为谁服务来说，同工人、农民是一样的。同时，我国现有知识分子队伍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因此，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就根本违背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并且代表党中央重申：从总体上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这个科学的结论，虽然早在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就代表党中央宣布了，但是，后来“左”的错误完全否定了它。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五届五次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这个科学分析和估计。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贡献和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优秀品质作了高度的评价。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指出，二十八年来，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做出了成绩。甚至在林彪、“四人帮”那样迫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时候，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科学技术工作。许多人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觉悟。这样的队伍，多么难能可贵！一九七九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会上，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十年里，广大文艺工作者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作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一扫过去对待知识分子的严重偏见，对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动员鼓舞作用。

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就必须对“红”与“专”的关系有正确的理解，对“红”“专”有合理的要求。邓小平同志科学地阐述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一个人，如果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既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他指出：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决不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专扯到一起。针对当时政治活动过多，业务时间太少，科研人员不能把全部身心用于科研的情况，他提出，必须保证科研人员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鼓励广大知识分子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发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上去。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就要正确对待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能只把开机床、种庄稼才算作劳动。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邓小平同志强调，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根据按劳分配原则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改变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工资偏低、实际上存在的待遇不合理状况，为脑力劳动者提供不可缺少的生活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将大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工人阶级和

全体劳动者的知识化，鼓励人们努力学科学、学文化，从而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很明确，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切身利益的。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努力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需要大力培养新的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人才和人才的培养，重视人民群众的知识化。一九七七年五月，在还没有出来工作时，他就明确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此后，他提出了三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意见：一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二是要建立正规的干部、职工培训制度；三是要改变干部队伍的构成，实现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他指出，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他把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看作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并把它作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保证之一。

现在，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还相当深广，一部分人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现象仍很严重。邓小平同志关于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这些论述在当时起到了拨乱反正的巨大作用，对于目前贯彻党在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大力兴办教育事业

在《邓小平文选》的许多篇章中，反复强调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对发展教育事业的各方面问题，都作了十分全面而科学的论述。他指出：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全党的事业，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党的十二大把发展教育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这一战略思想的确立，是和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分不开的。

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早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不顾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就狠抓了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工作的整顿。他指出：“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一九七七年五月，在他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情况下，就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向党提出了大抓科技和教育的建议。当恢复工作后，他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首先从教育和科技战线开全面拨乱反正之先河。

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是长期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他多次明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不是黑线而是红线；广大教师（包括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中，他科学地指出，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他呼吁全党、全社会要

“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道出了多少知识分子的心声！这无疑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最关键的一步。

为了迅速扭转“四人帮”长期造成的教育战线的混乱局面，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以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他提出要无例外地撤走工、军宣传队，恢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确立教师的主导作用，恢复考试制度；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这几年教育战线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些主张是十分正确而必要的。

发展教育是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

在一九七七年没有恢复工作前，邓小平同志就曾向党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同年九月，在他出来工作不久，又讲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以后他又多次强调了发展教育对四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作用。小平同志如此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他长期研究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这一思想后来构成我们党的一个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原理，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是基础。为什么说教育是基础呢？这是因为，不论是专门技术人才，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发明家等等，也不论是具有一定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一般生产工人、农民，都需要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科学技术愈发展，愈是离不开教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5页）。“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同上书第26卷第1册第210页）。

不仅物质生产离不开教育，精神生产尤其离不开教育。不仅科学技术需要教育来培植，社会的体育卫生、文化艺术、道德伦理、思想理论、社会风尚等等，都需要靠教育事业来培植。所以教育不仅是培养劳动力的条件，而且又是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伦理建设的一项基础。

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等，其内容和任务是十分广泛的，民族的文化遗产、生活的全部经验都要靠教育传递下去，一代胜过一代，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现代化建设事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于培养一代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有着非常重大意义。

教育的社会职能如此重要，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不仅要靠发展经济，而且还要靠发展教育，才能使我国长治久安，“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

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主张。

（一）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教育方面最中心的思想。过去，人们往往片面地把马克思提出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解为就是要让学生多参加劳动。其实，马克思主要是指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教育过程和物质生产过程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联系的。邓小平同志十分精确地说道：学生固然要适当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问题”，“我们的国民